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一 文学

饶宗颐⁻¹³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一 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楚辞论丛	1
楚辞地理考	51
楚辞书录	143
楚辞与词曲音乐	265
选堂赋话	327
文选厄言	399
文轍新编	545

中华书局
PDG



楚辞论丛

卷十一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学

楚辞论丛
PDG



Vertical text,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appearing as a dark, textured strip.

Vertical tex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title, appearing as a dark, textured strip.

Vertical tex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title, appearing as a dark, textured strip.



目 录

屈原与经术	5
骚言志说	11
《天问》文体的源流	
——“发问”文学之探讨	25
唐勒及其佚文	
——《楚辞》新资料	41
重读《离骚》	
——谈《离骚》中的关键字“灵”	46



屈原与经术

从表面看，屈原与经术似乎不该连在一起，况且《楚辞》在四部里是列在集部之首的。可是从事实上观察屈原的学问，却与经术有相当的渊源。现在我试拈出一些问题来讨论：

一、《离骚》的称经

(一) 王逸称《离骚》为经

《离骚章句叙》：“《离骚经》者……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二) 班固称淮南王安作《离骚传》

《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秘爱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①

(三) 汉宣帝认为合于经术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咏，亦云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

(四) 扬雄对“经”字的看法

扬雄《法言·吾子》篇：“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

^① 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惟王念孙于《读书杂志》中谓传当作傅。傅与赋通。近人杨树达又从而引申之。

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相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综合上列各点，我们由汉武爱骚，淮南作传，汉宣帝认为合于经术，及汉人以“事、辞相称则经”的尺度推论，那么，《离骚》的称经，应该在西汉时已经开始。到了王逸，承继前人未竟之业，用经生离章析句的方法去整理它，并且加上“章句”两字。以后宋人中的周必大就认为王逸将《离骚》称经是合理的。至于朱熹，仍然将它当作经书看待，称曰“离骚经”，保持传统的称谓，在《天问》各章都冠上“离骚”两个字。

二、屈原时，学术上还有九流十家的分别，他的学问属哪一类？他的辞赋是否配得上称经？

现在我首先谈谈各家对屈原的批判：

(一) 刘向称他做节士

《新序·节士》篇，刘向列举多个节士，屈原是其中的一位（文繁不录）。

(二) 扬雄称他颇为有智

《法言·吾子》：“或问：屈原知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三) 班固不同意扬雄的说法，但称许屈原是“妙才”

《离骚序》：“虽非明智（哲）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四) 王逸称他为大雅之士

《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诚博远矣。”

(五) 刘勰称他“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①

《文心雕龙·辨骚》：“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摘兹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为彼，语其夸诞则为此。固知《楚辞》者，体慢（宪）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六) 颜之推承袭班固的话，批评他“露才扬己”

《颜氏家训·文章》：“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① 博徒之博，即王逸其词博之博。

(七) 洪兴祖对屈原有深度的了解，称他是“圣贤之变者”，并且极力驳斥各家的批判

《楚辞补注》：“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语此。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

(八) 朱熹说“不敢直以辞人之赋视之”

《楚辞集注·序》：“窃尝论之，原之为入，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盖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拭泪讴唌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辞人之赋视之也。”

以上八说，大体都是从屈原的行为下断语。其中朱子之说，我最不同意。他可惜屈原不到北方去接受正统文化，因此变成变风变雅的末流，这点是很可商榷的。

春秋时代的楚国，虽受中原诸国的摈斥，不能参与中原的盟会，在政治上，没有重要的地位，但在文化上，并不见得怎样隔阂。《左传》里记载楚人“赋诗”的事不少，《国语》里记申叔时对楚庄王的谈话，及左史倚相的能读三坟五典等等，都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与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五经之学老早已经在楚国植根传播起来，屈原不必到北方去，已有足够的机会接受正统文化了。《史记》本传说他是个“博闻强记”的人。在《离骚》本文里，他常常引用经语，而《离骚》所表现的思想，也与经学息息相通，那么，屈原实在深受正统文化的熏陶。现在试从文辞及思想两方面加以探索。

三、《离骚》与群经

(一) 《论语》(有引号者，句出《论语》，下文见于他经者，例同。)

恐年岁之不吾与。^①

“日月逝矣，岁不我予。”

恐修名之不立。

① 《离骚》。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已矣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吾和其其亦已兮。

“莫我知也矣。”

愿依彭咸之遗则。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窃比于我老彭。”^①

(二)《易》

吾固知蹇蹇之为患兮。^②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结幽兰而延佇。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三)《书》

循绳墨而不颇。

“无偏无颇。”

皇天无私阿兮。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③

忽吾行此流沙兮。

“余波入于流沙。”^④

(四)《诗》

忽奔走以先后兮。

① 老彭：包咸注《论语》、《大戴记》都说老彭是殷贤大夫，与王逸所说的，当同是一人。

② 《离骚》。

③ 王逸引《周书》。

④ 《禹贡》。

“子曰有先后。子曰有奔奏。”

众女嫉予之娥眉兮。

“嫫首娥眉。”

见有娥之逸女。

“有娥方将。”

(五)《春秋》

恐皇舆之败绩。

“大崩曰败绩。”^①

以上所举的例子，可见屈原对于《论语》、《易》、《书》、《诗》、《春秋》这些书，都读得相当烂熟，并且吸收了它们的词语。

屈原在《离骚》里表现的思想，与经学息息相通的有四点：

(1) 修能与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修能

《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内美

《易·坤·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修能”与“修辞”，是“进德”的一体两面。屈原的“修能”，正是《易经》的“进德修业”、“修能与内美”，是分内外两层讲的。在儒学里，是最重要的一环。

(2) 善与义——“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善”与“义”，不用说，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大学》引《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

(3) 时——“哀朕时之不当”，“愿俟时乎吾将刈”，“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易经》：“时义大矣哉！”

“时”是易学中心思想，屈原“时”的观念，无疑是出源于《易经》的。

① 《左传》庄公十一年。

(4) 中正——“耿吾既得此中正”，“依前圣以折中兮”。

“中”的观念也是《易经》的主要观念。

总括来说，屈原的文章吸收了经书的词语，屈原的学问，会通了经学，而他的思想跟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有相承关系。不过他不是像一个章句之儒，只会在一章一句里讨生活。他对经学有深度的造诣，并且接受了若干主要思想。因此，可以说他深受儒家影响。虽不能说他完全是儒家，如果用汉人（扬雄）称经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文章的话，《离骚》称经大致不会有问题的。

至于他的学问究竟属于哪一类呢？明方以智在他的《象环寤记》论庄子、孟子与屈原有这么一句话：“扇扬大成药肆者也。”我的见解跟他大略相同。现在就引这句中肯的话，作为本题的结束——屈原是大成药肆的扇扬者。

在联合书院讲，李达良笔记



骚言志说

《诗》言志，《骚》亦言志。淮南之论屈子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公录以入传，故假《骚》以言志，其事汉、唐已然，而特盛于宋、明，盖又与义理之学有关。近世治《楚辞》者多措意于训诂校勘，而颇昧斯义。诗言志之说，朱自清已有专书讨论，若骚学则尚阙如。贾谊谪长沙，为文以吊屈原，其云“方正倒植”，又云“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既以自况，亦以自宽也。班固以《诗经》之《小弁》，与《离骚》相提并论。《汉书·冯奉世传》赞云：

谗邪交乱，贞民被害，而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词兴。

班氏虽议其露才扬己，然于骚之文辞，良深嗟叹，日月争光，非淮南之私褒，固天下之公言。借骚以言志，不特出于儒生，即缙流亦沿此途径，法琳即其例也。释彦棕著《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云：

帝（太宗）曰法琳虽毁朕宗祖，非无典据，特可赦其极犯，徙在盖郡为僧。法师见放，意不自得，因作《悼屈原》篇，用申厥志。其词曰：“何天道之幽昧兮，乖张列宿。使忠正之屈原兮，而见放逐。谗佞从旨兮，位显名彰。直言不讳兮，遂焉逢殃。和璞捐于山泽兮，燕石为珍。

西施佞而不幸兮，嫫母见亲。抚心思会屈原兮，博达广识。君王不察其贞正兮，斥逐去国。纳谗谄之诼惑兮，自昏厥德。燕苏弃于荒野兮，蔡藩见殖。鸱鸢鸣啸于君林兮，鸢鸾戢翼。豺狼当路而从横兮，麟麋伏匿。凤鸟尚知怀德兮，见覆巢而高翔。麒麟犹忻有道兮，驷不仁而腾驥。忠谏之不入兮，箕子佯狂。杜伯之谅直兮，遭尤逢殃。比干正而剖心兮，伍子胥贞而抉眼。痛清白之屈原兮，沉汨罗而不返。”……（琳）谓三五友人曰……昔屈原被谗放逐，原岂不为忠？卞氏献璧加刑，谁言是瑕？此亦时君用与不用也。屈原虽放逐，《离骚》盛行。……因为诗曰：仆乘屈原操，不探《渔父篇》。问言蓬转者，答为直如弦。^①

法琳见放，即以屈原自比。吊屈原之文字，历代甚多，如僧皎然有《吊灵均词》^②，王守仁有《引屈原赋》^③，若法琳之作，世罕知之，故为表彰于此。

两宋骚学盛行，晁无咎、朱考亭皆其尤也。晁氏重编楚辞；复取历代拟骚之作，自王逸《九思》至韩愈《复志赋》二十六人，其六十篇，为《续楚辞》；又录荀卿《成相》至顾况《招北客》等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为《变离骚》。区楚辞之流派为“续”与“变”。朱子因之，厘为《楚辞后语》，共五十二篇，起荀子《成相》，终吕大临之《拟招》，而揭其遴选之准则有二：曰“辞”，曰“义”。其言云：“晁氏之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今因其旧，则其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夫辞者，文之外形；而义者，文之寓旨。治骚者于“辞”与“义”固皆宜措意。惟义为一切文学之内蕴，举凡诗文词曲，有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者，无不与《离骚》之微旨相通。如是而博稽遍考，则将泛滥而莫知所裁矣。

宋人之治《楚辞》，有二途焉：一拟其文，如黄山谷是也；一求其文或思更有以正之，如东坡经屈原祠下为赋以诋扬雄，而申原之志。其辑之乱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朱子以为此有发于屈原之心，故其论屈原也，称其不能合于中庸之道。即洪兴祖论“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朱子虽援其说于后语，而始终以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似缘东坡以立说。此宋人治《楚辞》

① 《大正藏》第五十史传部二。

② 《昼上人集》。

③ 《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外集一。

而又有以正之者也。

朱子收吕大临《拟招》，谓此词寓夫求放心、复常性之微意，故附之使游艺者知有所归宿，尤具深意所在，此则因辞而正之者也。复云：“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资道之微。……圜豚放驰，散无适归。……魂兮来归反故居，盖归休兮复吾初。……曷自苦兮一方拘，魂兮来归故居。”则不为屈子招魂而亦为一己招魂。如孟子云求其放心，用意尤深长也。

朱子谓屈子志行过于中庸，不知《离骚》自言“耿吾既得此中正”。《九章·惜诵》云：“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枘中。”中正之义，本于易教。《骚》云“我固知蹇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二句，实用蹇卦语。屈子尝熟读《易》，盖无疑也。

宋人注《楚辞》者特多，盖托《楚辞》以言志。洪兴祖之为《楚辞补注》是也。兴祖《楚辞》学，远有所承。直斋称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引洪氏自序，今本无之。可能因其获罪而为人所删削，故意没著者名姓，故其序不载于今书。《宋史·儒林传》称其南渡后，知真州、饶州，忤秦桧，编管昭州，卒。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记：

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丙戌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洪兴祖送昭州编管。先是右正言王珣言：故龙图阁学士程瑀本实妄庸，见识凡下……其窃世之誉如洪兴祖者，则为文以冠其首……朋附鼓唱异说。珣又言：兴祖天姿阴险，趋向不正，如程瑀妄人之雄者，兴祖倾心附之，结为死党。……于是刑部尚书韩侂胄乞将兴祖送昭州，并编管。

《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兴祖有“圣贤眼目一卷”，其人以希圣自居。其论屈子长文，今附载《补注》中。自序虽亡，而微旨可见。

其后朱子著《楚辞集注》，则为赵汝愚而作。《历代诗馀》卷一一八引宋名家词评云：“汝愚谪后，晦庵注楚辞以表之。”此说亦见周密《齐东野语》记绍熙内禅事。

余考嘉庆间谭抡纂《福鼎县志》卷八有杨楠作《朱子楚辞集注跋》云：

庆元乙卯，楠侍先生于考亭精舍。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楠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

《孟》、《中庸》四书，资以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某辈亦不敢有请焉。

又题后自注云：“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公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志。”乙卯即宁宗庆元元年。此篇端平本不载，至可宝也。

杨榘字通老，杨兴宗从弟，与杨方、杨简为朱门高弟，时号三杨，官莆田尉、湖南提刑。《县志》入《理学传》（卷六）。选举表榘淳熙五年戊戌进士。朱子《答黄直卿论杨通老书》，即此人也。《县志》黄崎山条：“闽穷海也。有屏风山为障。又有文星明山，朱子避伪禁到此止焉。作《中庸·序》于民家，乡僻无纸，写序于屏，后舁入州库。”朱子晚岁因伪学之故，转徙至于福鼎。《县志》所言，可补史传，故并记之。

太史公以屈贾并论而作合传，明人则喜言“屈、扬”。举例言之：

（一）李贽

李生曰离骚，离，忧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

屈子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①

史公《屈传》引《易》“王明并受其福”，李贽云：

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

此以人臣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广忠益者，真大忠也。

此誉屈原为大忠。

（二）明诸城邱志广《为离骚太玄作》一篇云：

《离骚》、《太玄》，千古奉之为“经”。屈原本于忠，扬雄嗜其奥。

文以明白简易入情入理为主。如《论语》、《孟子》在十三经中，是千古奉之为经者，何曾有诘屈之词如屈、艰深之词如扬哉？

^① 《温陵集》十六“反骚”条。